

董事会职能、内部控制缺陷定量认定标准 与内部控制审计费用

芦雅婷^{1,2}

(1. 天津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 天津 300222; 2. 唐山学院 会计系, 河北 唐山 063000)

[摘要]以2012—2016年沪深A股单独披露内部控制审计费用的公司为研究对象,从董事会监督和咨询职能以及董事会对内部控制缺陷定量认定标准的自由裁量角度分析内部控制审计费用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董事会监督职能、内部控制缺陷定量认定标准与内部控制审计费用显著正相关;董事会咨询职能与内部控制审计费用显著负相关;内部控制缺陷定量认定标准在董事会监督职能对内部控制审计费用的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在董事会咨询职能对内部控制审计费用的影响中具有调节效应。

[关键词]内部控制审计费用;董事会;监督职能;咨询职能;缺陷定量认定标准;公司治理

[中图分类号]F23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3114(2019)02-0030-09

一、引言

内部控制(以下简称内控)审计始于2002年美国SOX404条款,该条款要求企业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其内控的有效性并披露内控审计报告。这种做法逐渐被许多国家或地区借鉴。我国自2008年建立企业内控规范体系开始,上市公司逐步进入内控强制审计和披露阶段。与SOX404条款要求实施整合审计且未规定公众公司须单独披露内控审计费用不同,我国的《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并未强制要求事务所执行整合审计,上市公司可自行单独选择执行年报审计和内控审计的事务所。因此,国外自愿披露内控审计费用的公众公司很少^[1],导致国外至今没有关于内控审计费用的单独研究,而我国单独披露内控审计费用的沪深主板A股上市公司2012年至2016年共有5334家^①。这些内控审计费用信息的公开披露,可在我国资本市场上传递内控审计服务的价格信息,增加信息透明度;同时我国内控审计对财务报告审计的非附属性,也有利于我们深入研究我国内控审计服务的定价规律,从而加深对内控审计服务市场的认识。

内控审计机构的聘请、变更或续聘以及费用的确定须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亦即董事会拥有内控审计费用最终的审批确认权,那么,董事会所具有的监督和咨询双重职能对确认支付的内控审计费用是否会存在影响呢?如果存在影响,那么影响路径又是什么?尽管国内外对内控审计费用的确定展开了较为丰富的研究,但涉及公司治理方面的影响因素较少,并且对于公司治理特征影响内控审计费用的具体路径缺乏经验证据。2008年《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明确要求对内部监督所发现的重大缺陷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2010年《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中明确了公司董事会对建立健全和有效实施内控

[收稿日期]2018-09-11

[基金项目]河北省科技计划项目软科学研究专项(184576421;17454014)

[作者简介]芦雅婷(1984—),女,湖北武汉人,天津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博士生,唐山学院会计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审计理论与内部控制,邮箱:luyating_susie@126.com。

^①其中2016年1312家,2015年1268家,2014年1179家,2013年883家,2012年692家。数据来源于DIB数据库。

规范体系的责任,并规定重大缺陷由董事会予以最终认定,同时要求企业结合自身情况和关注的重点,自行确定内控重大、重要和一般缺陷的具体认定标准;2012年财政部在《内控规范体系实施问题解释第1号的通知》中要求企业从定性和定量的角度综合考虑内控缺陷认定标准,并保持相对稳定。可以看到,董事会被赋予了内控缺陷认定的自由裁量权并承担重大缺陷的追责义务。由此本文提出以下问题:董事会自由裁量的内控缺陷定量认定标准(以下称:认定标准)宽严程度不同,经济后果是否不同,即是否影响内控审计费用?认定标准能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董事会监督和咨询职能与内控审计费用间的关系?目前国内外对企业内控评价工作中的内控缺陷认定标准这一关键问题的研究并不充分。鲜有关于认定标准制定决策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仅国内个别学者从公司治理角度研究影响认定标准宽严程度的因素,如谭燕^[2]、王俊和吴溪^[3]的研究。而关于公司董事会自由裁量认定标准的经济后果的研究成果也很少,仅张俊民等研究发现认定标准与内控审计定价的影响显著正相关^[4]。

本文将研究董事会职能和认定标准对内控审计费用的影响,以及从认定标准视角研究董事会职能对内控审计费用的作用路径,可能的贡献在于:(1)运用代理理论和友好董事会假说深入分析董事会职能对内控审计服务的定价规律,有利于监管机构掌握市场主体的定价行为,从而为制定科学的监管政策进而合理引导定价提供依据。(2)将董事会职能、治理层与审计师博弈的结果——认定标准以及内控审计费用纳入同一分析框架,这有助于理解董事会职能对内控审计费用影响的作用机理,不仅能丰富内控审计费用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而且也将为企业内控评价的监管提供经验证据。

二、理论分析

内控审计是由会计师事务所作为供给方为需求方提供的一种特殊专业服务,这种服务价格的确定是供给方与需求方双方博弈的结果^[5]。作为供给方,会计师事务所若要提供内控审计服务,首先会考虑内控审计的成本,其是由需求方的特征,如公司规模^[5-8]、盈利能力^[1]、业务复杂程度^[5,7]、公司治理特征中的股权集中度和董事会独立性^[9]、内控审计业务特征^[5]以及上市公司自由裁量的认定标准的宽严程度^[4]等确定的必要审计程序、审计证据的多寡以及审计测试范围的大小而决定;其次,审计作为一种由具有执业资格的专业人员提供的专业服务,一旦失败,注册会计师以及会计师事务所将面临诉讼风险和名誉损失,因此,供给方需考虑预期损失费用,包括面临诉讼风险带来的诉讼损失以及恢复名誉的潜在成本等^[10];最后,供给方还会考虑正常利润,因为这是保证内控审计服务持续供给的必要条件。作为需求方,被强制要求执行内控审计的上市公司购买该服务,首先考虑自身支付能力所限制的能够购买的内控审计服务数量,然后,鉴于会计师事务所的声誉在资本市场中有着积极的信号传递作用^[11],需求方还会考虑自身对事务所的偏好,如会计师事务所声誉^[5,7-8]以及行业专长^[7]等来选择内控审计服务。

(一) 董事会职能与内控审计费用的关系

作为公司治理的核心以及企业经营管理决策主体的董事会,其职能的有效发挥能改善公司治理质量,并提高企业经营效益。董事会的主要职能一个是由 Fama 等基于代理理论提出的监督职能^[12],认为董事会,尤其是独立性强的董事会可以约束公司经理层以降低代理成本,并保护投资者利益;另一个是由 Adams 等提出的友好董事会假说所阐述的咨询职能^[13],认为董事会决策是以信息为基础,而代理问题会对内外部董事的信息沟通产生间接影响,董事会职能不仅仅是监督,更重要的是为经理层提供必要的战略咨询和建议。

1. 董事会监督职能与内控审计费用的关系

根据代理理论,两权分离将导致股东承担过高的代理成本以及小股东“搭便车”,使得企业管理层可凭借专有信息最大化私有利益,而董事会代表股东行使委托人权力,监督管理者行为以保护股东利益。其中,外部董事具有更强的监督能力^[14],一方面因为外部董事具有客观的独立性和主观的能动性,可以刺激并监督管理层间的竞争,从而有效降低管理者对股东权益的侵害^[15];另一方面由于外

部董事存在声誉保护动机,降低了外部董事与管理者间的“合谋”概率,从而有效削弱管理层对董事会的控制^[12]。因此,董事会中外部董事的比例越高,董事会监督职能越强。而董事会监督职能对内控审计费用的影响可能是正向的,理由在于:其一,外部董事一般是由具有一定声望的专家学者担任,为维护声誉,外部董事会督促公司聘用声誉更高的事务所执行内控审计,为此支付更高的价格购买内控审计服务;其二,由于外部董事对公司管理层财务舞弊和利己主义行为的监督职责,使得其对公司内控质量尤为关注,因此,外部董事比例越高,这种关注会越多,公司就越倾向于选择内控审计质量高的审计师,而此类审计师的内控审计收费也相应较高;其三,外部董事在企业内控体系的建设和健全过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外部董事比例越高,公司内控质量越高^[16]。作为内控审计需求方的上市公司,基于信号传递功能,可能会通过购买高价的内控审计服务向资本市场传递其内控质量高的信号。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董事会监督职能的发挥是对内控质量的事后监督,董事会将积极要求管理层对存在的内控缺陷实施修复,从而使得上市公司内控缺陷存在的可能性和严重程度降低^[2],这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小审计师的内控审计风险,减少内控审计的工作量,从而降低内控审计费用。因此,基于上述两者关系的不确定,本文提出以下竞争性假说:

假设 1a: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董事会监督职能与内控审计费用正相关。

假设 1b: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董事会监督职能与内控审计费用负相关。

2. 董事会咨询职能与内控审计费用的关系

根据友好董事会假说^[13],董事会有效行使咨询职能的前提是获取充分的上市公司信息。获取途径有两个:一是通过监管部门强制要求披露的信息获取;二是在董事会议事过程中从管理层汇报或呈现的信息中获取^[15]。而董事会议事过程中披露的信息在内外部董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内部董事因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而获得专有信息,具有信息优势;外部董事因不在企业任职而具有天然的信息劣势,但其具备专业知识或行业专长。因此,一旦外部董事无法获取企业专有信息以全面深入地了解企业战略、经营财务状况,就无法利用自身资源,为企业与外部经济环境以及其他组织的沟通搭建桥梁,也无法为企业提供专业建议。也就是说,一方面,企业信息越不对称将导致有效信息越匮乏,董事会也就越难发挥咨询效力^[12],难以为企业战略决策的制定与执行提供优化建议与资源,从而影响企业管理和决策效率,进而影响企业经营绩效的提高^[17];另一方面,董事会咨询职能无法有效发挥,将不利于企业内控的建立与健全,无法减少舞弊或差错的发生,从而增加审计风险。从内控审计供给方的角度来看,被审计单位财务状况不佳会带来破产风险以及审计失败概率的增加,导致注册会计师承受的诉讼风险提高,进而要求更高的内控审计费用,以弥补较高的预期损失费用。此外,相对于监督职能的滞后,董事会咨询职能在内控建立与执行的全过程中(事前和事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因此,董事会咨询职能越强,上市公司内控设计和运行将越合理有效,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内控审计的压力,从而减少内控审计费用。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2:

假设 2: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董事会咨询职能与内控审计费用负相关。

(二) 认定标准与内控审计费用的关系

企业内控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中明确上市公司对内控缺陷认定标准的自由裁量权,并赋予董事会对重大缺陷认定与追责的裁量权。同时,注册会计师执行内控审计业务时也面临着内控缺陷的认定问题。而注册会计师与上市公司各自确定的认定标准间存在紧密联系,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上市公司以及注册会计师均根据年报审计确定的重要性水平来评价内控缺陷重要性水平^[18],而在风险评估程序中,注册会计师需要考虑企业管理层对重要性的判断;第二,《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明确要求,在计划审计工作中,注册会计师必须评价上市公司确定的重要性以及内控重大缺陷影响因素对内控审计工作的影响。如果认定标准确定得过严,说明对内控缺陷导致的错报、漏报或损失的容忍度较差,那么执行内控审计的注册会计师选择拟测试的内控范围更广,确定测试所需收集的审

计证据更多。因此,从内控审计供给方的审计成本角度来看,越严格的认定标准,内控审计成本越高,即内控审计费用越高。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3:

假设3: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认定标准的严格程度与内控审计费用正相关。

(三) 认定标准在董事会监督职能与内控审计费用关系中的中介效应

认定标准是企业对内控收益和内控成本的权衡。定量认定标准过于宽松将导致内控缺陷无法识别,隐藏在经营活动中的风险不能及时得到预警^[10],最终无法获得将风险控制可在承受范围内而减少损失的内控收益;相反,定量认定标准过于严格,将导致内控在制定和执行中发生的直接成本以及信息传递成本和公司决策效率下降的机会成本等间接成本提高^[10]。而董事会监督职能的发挥,即董事会权力由独立董事主导,能降低管理层为减少自身约束而制定宽松定量认定标准的可能,从而有效发挥外部董事的监督效力,促使企业选择更严格的认定标准,进而实施严格控制,获得内控收益。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董事会监督职能在对内控审计费用产生直接影响的同时,也会对认定标准产生影响,而认定标准又会将这种影响传递给内控审计费用。因此,我们认为,认定标准很可能起到一种桥梁作用,董事会咨询职能很可能通过影响缺陷定量认定标准来影响内控审计费用。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4:

假设4:认定标准在董事会咨询职能对内控审计费用的影响中具有中介传导效应。

(四) 认定标准对董事会咨询职能与内控审计费用关系中的调节效应

上市公司制定更严格的认定标准,表明上市公司能够识别内控重大、重要和一般缺陷的范围更广,公司会因介意某项控制存在的设计或运行漏洞或偏差而采取行动修复缺陷,进而健全内控。因此,相对更严格的认定标准更能合理保证内控目标的实现,降低上市公司发生错报和舞弊的可能,从而降低经营失败的可能,进而降低作为内控审计供给方的注册会计师所面临的诉讼风险。同时,如前所述,董事会咨询职能对内控审计费用的负向影响体现在董事会咨询职能的发挥使得上市公司的管理与决策效率提高,进而带来经营业绩的提升。此外,咨询职能的发挥有助于内控的建立健全,以防止舞弊或差错的发生,进而降低注册会计师因上市公司破产风险或审计失败概率增加所承受的诉讼风险,即降低预期损失费用,从而使内控审计费用也降低。因此,严格的认定标准将通过降低诉讼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增强董事会咨询职能对内控审计费用的负向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5:

假设5:严格的认定标准能够增强董事会咨询职能与内控审计费用之间的反向关系。

三、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2—2016年沪深主板A股中单独披露内控审计费用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剔除ST、金融类、财务数据不全以及年报定量重大缺陷评价标准缺失或为绝对额的样本公司,筛选后共获得3737个有效样本。本文使用的财务数据来自于CSMAR数据库,内控相关数据来自DIB数据库。数据采用Stata14.0进行处理,所有连续变量均进行了1%水平上的Winsorize处理。

(二) 变量的选取

1. 因变量的选取。内控审计费用($LnICfee$)用上市公司内控审计费用的自然对数来衡量。

2. 自变量的选取。本文的自变量包括:衡量董事会监督职能的外部董事比例($Rate$),比例越高,董事会的监督职能越强;借鉴谭燕等的研究,采用信息不对称程度(Std)衡量董事会咨询职能^[2],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董事会的咨询职能越弱。

3. 中间变量的选取。借鉴谭燕等、张俊民等的做法^[2,4],本文以财务报告重大缺陷的定量认定标准来界定认定标准的严格程度($FaultR$)。如果样本公司的利润类、收入类、资产类和权益类认定标准的下限均低于或等于对应指标的均值(分别为5.79%、1.60%、1.39%和1.87%),则确定为严格的认定标准, $FaultR$ 取值为1;反之,只要存在的各认定标准的下限有一个或更多高于对应的指标均值,则

确定为宽松的认定标准, $FaultR$ 取值为 0。

4. 控制变量。参考相关研究^[1, 5-8], 本文选取公司规模 ($Lnasset$)、子公司数量 (Spe)、资产收益率 (Roa)、产权性质 (Soe)、内控质量 (Icq)、公司所在地区 ($Locate$)、资产负债率 (Lev)、事务所类型 ($ICAudit$)、审计师行业专长 ($Expert$) 以及整合审计 (IA) 为控制变量, 并控制行业和年度。其中, Icq 为 0-1 变量, 内控指数大于均值时 Icq 取值为 1; 公司总部所在地为东部地区 $Locate$ 取值为 0, 中部地区取值为 1, 其余则为西部地区取值为 2; $ICAudit$ 为 0-1 变量, 当年内控审计师来自“四大”取值为 1; $Expert$ 为 0-1 变量, 某事务所审计收费占全行业比重超过 20% 取值为 1; IA 为 0-1 变量, 事务所同时提供内控和年报审计取值为 1。

(三) 模型的构建

根据前面的研究假设和变量定义, 本文构建模型 (1) (2) 和 (3) 来检验认定标准在董事会监督职能与内控审计费用关系中的中介效应, 具体是:

构建模型 (1) 来检验董事会监督职能与内控审计费用的相关性:

$$\ln ICfee = \alpha_0 + \alpha_1 Rate + \alpha_2 Lnasset + \alpha_3 Spe + \alpha_4 Roa + \alpha_5 Soe + \alpha_6 Icq + \alpha_7 Locate + \alpha_8 Lev + \alpha_9 ICAudit + \alpha_{10} Expert + \alpha_{11} IA + \alpha_{12} Ind + \alpha_{13} Year + \varepsilon \quad (1)$$

构建模型 (2) 来检验董事会监督职能与认定标准的相关性:

$$FaultR = \beta_0 + \beta_1 Rate + \beta_2 Lnasset + \beta_3 Spe + \beta_4 Roa + \beta_5 Soe + \beta_6 Icq + \beta_7 Locate + \beta_8 Lev + \beta_9 ICAudit + \beta_{10} Expert + \beta_{11} IA + \beta_{12} Ind + \beta_{13} Year + \varepsilon \quad (2)$$

构建模型 (3) 来检验认定标准在董事会监督职能对内控审计费用影响中的中介传导效应:

$$\ln ICfee = \gamma_0 + \gamma_1 FaultR + \gamma_2 Rate + \gamma_3 Lnasset + \gamma_4 Spe + \gamma_5 Roa + \gamma_6 Soe + \gamma_7 Icq + \gamma_8 Locate + \gamma_9 Lev + \gamma_{10} ICAudit + \gamma_{11} Expert + \gamma_{12} IA + \gamma_{13} Ind + \gamma_{14} Year + \varepsilon \quad (3)$$

构建模型 4 来检验董事会咨询职能与内控审计费用的相关性, 并通过样本分组对认定标准严格组和宽松组分别进行回归分析来检验认定标准在董事会咨询职能与内控审计费用关系中的调节效应:

$$\ln ICfee = \delta_0 + \delta_1 Std + \delta_2 Rate + \delta_3 FaultR + \delta_4 Lnasset + \delta_5 Spe + \delta_6 Roa + \delta_7 Soe + \delta_8 Icq + \delta_9 Locate + \delta_{10} Lev + \delta_{11} ICAudit + \delta_{12} Expert + \delta_{13} IA + \delta_{14} Ind + \delta_{15} Year + \varepsilon \quad (4)$$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分析与单变量检验

表 1 列示了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 1 Panel A 可见, 我国上市公司的内控审计费用高低不等, 存在较大差距; 董事会监督和咨询效力强弱不均, 存在一定的差距; 认定标准宽松程度不同, 也存在较大差距。Panel B 列示了分组 T 检验的结果, 可以看到, 外部董事比例较高组、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组以及认定标准较严格组的内控审计费用均显著高于外部董事比例较低组、信息不对称程度较低组以及认定标准宽松组。

表 1 描述性统计

Panel A: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	样本量	最小值	均值	中位数	最大值	标准差			
$\ln ICfee$	3737	11.513	12.703	12.612	14.736	0.621			
$Rate$	3737	0.333	0.385	0.364	0.889	0.088			
Std	3737	0.054	0.141	0.128	0.394	0.062			
$FaultR$	3737	0	0.652	1	1	0.477			
Panel B: 自变量和中间变量的分组 T 检验									
因变量	$Rate$ 较高	$Rate$ 较低	T 值	Std 较高	Std 较低	T 值	$FaultR=1$	$FaultR=0$	T 值
$\ln ICfee$	12.773	12.671	-4.706***	12.737	12.654	-4.025***	12.749	12.617	-6.216***
N	1190	2574		1502	2235		2435	1302	

注: ***, **, * 分别表示在 1%、5%、10% 统计水平下显著。下同。

(二) 回归分析

1. 认定标准在董事会监督职能与内控审计费用关系中的中介效应

由表2中模型(1)和模型(3)的回归结果^①可以看到,外部董事比例与内控审计费用均在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即外部董事比例越高,代表董事会监督职能越强,内控审计费用越高,支持了假设1a,拒绝了假设1b,即董事会为维护其监督职能而购买高质量的内控审计服务的需求超过了董事会监督职能对内控审计的替代作用。另外,由表2中模型(2)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外部董事比例的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外部董事比例较高,即董事会监督职能越强的公司,其认定标准越严格,这与谭燕等的研究结论^[2]一致。最后,由表2中模型(3)(因变量为内控审计费用)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认定标准的严格程度的系数在10%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认定标准的严格程度与内控审计费用显著正相关,即假设3得到支持,这与张俊民等的研究结论^[4]一致。同时,可以看到,外部董事比例的系数也显著为正,但是其系数值(0.221)小于模型1中外部董事比例的系数值(0.227)。此外,模型(3)的调整的R²比模型1的调整的R²略大,说明模型3比模型1的拟合优度好。

上述回归结果说明,在模型(1)中,董事会监督职能对内控审计费用的总体影响可以拆解为两项:第一项是对内控审计费用的直接影响,这反映在模型(3)的外部董事比例的系数上;第二项是通过认定标准严格程度再影响内控审计费用的间接影响,这反映在模型(2)的外部董事比例系数与模型(3)的认定标准严格程度系数上(间接影响的值等于这两个系数的乘积)。综上,认定标准在董事会监督职能对内控审计费用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传导作用,且中介传导效应的大小为0.006(0.227-0.221),占总效应的比重为13.54%(1.182×0.026/0.227)。这些结果支持了假设4,亦即董事会监督职能的发挥是通过制定更严格的认定标准来导致内控审计费用提高的。

表2 认定标准中介效应的回归分析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系数	T值	VIF	系数	Z值	VIF	系数	T值	VIF		
Rate	0.227**	2.42	1.17	1.182**	2.39	1.07	0.221**	2.36	1.17		
FaultR	—	—	—	—	—	—	0.026*	1.67	1.04		
模型的拟合优度检验及方差结果	N	adj. R ²	F	Sig.	N	Wald chi2	Prob > chi2	N	adj. R ²	F	Sig.
	3737	0.5096	115.33	0.000	3737	132.04	0.000	3737	0.5099	112.32	0.000

注:在考虑异方差的基础上采用修正异方差的标准误的OLS。下同。

2. 认定标准在董事会咨询职能与内控审计费用关系中的调节效应

由表3中模型(4)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上市公司当年股票月收益的标准差与内控审计费用分别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即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董事会咨询职能越弱,公司的内控审计费用越高,支持了假设2,即董事会咨询职能对内控审计具有替代作用。同时,外部董事比例与内控审计费用在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认定标准的严格程度与内控审计费用分别在10%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与前述结论一致。另外,为验证认定标准对董事会咨询职能与内控审计费用的调节效应,引入交乘项后,交乘项和FaultR的VIF值都超过或接近10,说明变量间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按认定标准的严格和宽松将样本分组,再分别对各组样本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的(2)(3)列,可以看到,股票月收益的标准差的回归系数,在认定标准严格的样本组中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而在认定标准宽松的样本组为负,但不显著。并且从似无相关模型SUR的组间系数差异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到,Std的系数差异卡方值为5.47,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股票月收益的标准差对内控审计费用的影响在认定标准严格和宽松时存在明显差异,即认定标准越严格,股票月收益的标准差与内控审计费用的正向关系

①控制变量结果省略,留存备案。表3同。

越显著,这证明了严格的认定标准增强了董事会咨询职能与内控审计费用之间的反向关系,假设 5 得到支持。

表 3 认定标准调节效应的回归分析

变量	(1) 模型 4			(2) 认定标准宽松 (<i>FaultR</i> = 0)			(3) 认定标准严格 (<i>FaultR</i> = 1)		
	系数	T 值	VIF	系数	T 值	VIF	系数	T 值	VIF
<i>Std</i>	0.338 **	2.35	1.55	-0.151	-0.63	1.55	0.557 ***	3.15	1.55
<i>FaultR</i>	0.026 *	1.70	1.04	—	—	—	—	—	—
<i>Rate</i>	0.210 **	2.25	1.17	-0.500 ***	-2.87	1.17	0.451 ***	4.43	1.17
N	3737			1302			2435		
adj. R ²	0.5105			0.4362			0.5432		
F	109.97			34.55			97.48		
认定标准宽松 VS 严格变量 <i>Std</i> 的系数差异						5.47 **			

(三) 样本选择问题

进一步地,由于样本中很可能存在披露内控审计费用的公司具备更强的董事会监督职能或制定更加严格的认定标准,本文采用 Heckman 两阶段来解决样本选择问题。借鉴汤晓建和张俊生等的研究,并将行业竞争程度 (*Comp*) 作为外生变量纳入第一阶段 Probit 回归^[19],然后将第一阶段估计的 λ 放入第二阶段回归,结果见表 4。从表 4 可以看到,关键变量 *Std*、*FaultR* 和 *Rate* 的回归系数依然在 5% 或 10% 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在考虑了样本选择问题后结论仍然成立。

表 4 Heckman 两阶段检验结果

变量	第一阶段 Probit 回归		变量	模型 1 第二阶段 OLS 回归		模型 4 第二阶段 OLS 回归	
	系数	Z 值		系数	t 值	系数	t 值
<i>Llnasset</i>	0.145 ***	10.24	<i>Std</i>	—	—	0.293 **	2.06
<i>Roa</i>	-0.976 ***	-2.89	<i>FaultR</i>	—	—	0.0287 *	1.89
<i>Soe</i>	0.233 ***	6.77	<i>Rate</i>	0.220 **	2.51	0.205 **	2.33
<i>Icq</i>	-0.0787 **	-2.13	<i>Llnasset</i>	0.295 ***	25.01	0.295 ***	25.09
<i>Lev</i>	-0.755 ***	-7.95	<i>Spe</i>	0.016 **	2.55	0.015 **	2.44
<i>ARlnw</i>	0.141	1.63	<i>Roa</i>	-0.282	-1.55	-0.260	-1.43
<i>Lloss</i>	-0.325 ***	-6.23	<i>Soe</i>	-0.016	-0.69	-0.017	-0.73
<i>Type</i>	-0.237 ***	-3.87	<i>Icq</i>	-0.027	-1.60	-0.028 *	-1.66
<i>Opinion</i>	0.149 *	1.67	<i>Locate</i>	-0.037 ***	-3.69	-0.036 ***	-3.58
<i>Comp</i>	4.042 ***	5.91	<i>Lev</i>	-0.031	-0.43	-0.031	-0.43
			<i>ICAudit</i>	0.380 ***	11.73	0.382 ***	11.82
			<i>Expert</i>	0.205 ***	6.26	0.206 ***	6.26
			<i>IA</i>	-0.093 *	-1.83	-0.093 *	-1.85
			λ	0.136	1.28	0.118	1.11
_cons	-2.816 ***	-9.59	_cons	5.902 ***	18.64	5.859 ***	18.52
Ind&Year	—		Ind&Year	Y		Y	
N	6567		N	3737		3737	
Pseudo R ²	0.0396		adj. R ² S	0.5060		0.5067	

(四) 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提高结论的可靠性,本文进行如下稳健性测试:(1)采用滞后一期的董事会监督职能和咨询职能变量分别替代上述模型(1)至模型(4)中的当期指标,以减少内生性问题。(2)重新定义认定标准,以利润、收入、资产和所有者权益认定标准的宽严个数与公司所有认定标准个数之比重重新定义中间变量 *FaultRate*,重复上述回归。(3)用虚拟变量董事会类型 (*Dtype*) 代替外部董事比例 (*Rate*) 来衡量董事会监督职能。当上市公司同时满足董事长和总经理“非两职合一”和外部董事比

例大于 50% 两个条件时, $Type$ 取值为 1, 代表董事会监督职能较强; 否则取值为 0。对模型(1)至模型(3)重新回归。(4)用变量非流动比率 $(ILL = \sqrt{\frac{|\text{个股年平均收益率}|}{\ln \text{股票年交易量}}})$ 代替当年股票月收益的标准差作为信息不对称的衡量指标, 对模型(4)重新回归。(5)借鉴 Kim 等的研究^[20], 采用模型 $Invest_{i,t} = \beta_0 + \beta_1 Lnasset_{i,t-1} + \beta_2 Lev_{i,t-1} + \beta_3 Age_{i,t-1} + \beta_4 Cash_{i,t-1} + \beta_5 Growth_{i,t-1} + \beta_6 Ret_{i,t-1} + \beta_7 Invest_{i,t-1} + Ind + Year + \varepsilon$ 回归后残差的绝对值来估计企业非效率投资水平 ($Ineff$), 并用 $Ineff$ 代替股票月收益的标准差 ($Ineff$ 指标数值越大, 说明董事会咨询职能效应越差) 对模型(4)重新回归。上述结论均与前文一致, 结果稳健 (稳健性检验结果留存备索)。

五、结论性评述

董事会同时拥有内控审计费用最终审批确认权与内控缺陷认定的自由裁量权并承担重大缺陷的追责义务, 这导致董事会的监督和咨询职能必将影响内控审计费用的确定, 同时董事会裁量的认定标准严格程度将会影响二者间的关系。我们的研究发现, 董事会监督职能越强, 内控审计费用越高; 董事会咨询职能越弱, 内控审计费用越高; 认定标准越严格, 内控审计费用越高; 认定标准在董事会监督职能对内控审计费用的影响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传导效应; 认定标准在董事会咨询职能对内控审计费用的影响中具有调节效应。

基于此, 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1) 从内控审计服务的提供方来看, 一方面, 需求方外部董事比例越大, 虽然越能减少“内部人控制”问题, 增强董事会的监督职能, 但却使得供给方内控审计成本升高; 另一方面, 需求方信息不对称问题越严重, 就越无法发挥董事会咨询职能, 使得供给方内控审计的预期损失费用升高。因此, 为维护内控审计服务这一竞争市场的秩序, 监管部门应掌握需求方的定价行为, 在遵循市场定价的基础上, 合理引导内控审计定价, 制定内控审计收费标准。(2) 鉴于董事会监督职能的充分发挥通过制定更严格的认定标准这一路径传导至内控审计费用, 认定标准的严格程度能够加强董事会咨询职能与内控审计费用间的反向关系, 因此, 在上市公司与审计师的博弈中, 为减少内控审计定价过程中的不当行为, 以及减少上市公司为隐瞒内控缺陷而可能存在的缺陷认定机会主义行为, 监管部门须减少上市公司内控缺陷认定的自由裁量权, 颁布更具可比性的认定标准制定指导方案, 从而促进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内控, 同时使得内控审计收费的合理性能被有效监督。

本文对认定标准的度量仅是借鉴现有研究, 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以后的研究可以细化该变量的度量方法。从趋势上, 随着我国上市公司执行内控规范体系的实践不断增多, 上市公司治理层、管理层与审计师间关于内控审计费用以及内控缺陷认定标准博弈增多, 这一领域仍有较大研究空间, 后期可进一步研究内控审计服务定价的规律, 从更多或更宏观的视角考察内控审计费用的影响因素, 也可以继续考察公司董事会自由裁量的内控缺陷认定标准 (包括定量和定性认定标准) 的经济后果, 从而为企业内控评价制度的完善提供有益参考。

参考文献:

- [1] Eldridge S W, Kealey B T. SOX costs: Auditor attestation under section 404[J]. University of Nebraska at Omaha Working Paper, 2005.
- [2] 谭燕, 施赟, 吴静. 董事会可以随意确定内部控制缺陷定量认定标准吗? ——来自 A 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会计研究, 2016(10): 70-77.
- [3] 王俊, 吴溪. 管理层变更伴随着更严格的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吗? [J]. 会计研究, 2017(4): 81-87.
- [4] 张俊民, 芦雅婷, 傅绍正. 内部控制缺陷定量认定标准与内部控制审计定价[J]. 商业研究, 2018(7): 96-103.
- [5] 方红星, 陈娇娇, 于巧叶. 内部控制审计收费的影响因素研究[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16(4): 21-29.

- [6] Krishnan J, Rama D, Zhang Y. Costs to comply with SOX section 404[J].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 2008, 27(1): 169 - 186.
- [7] 傅绍正. 内部控制审计收费的影响因素研究[J]. 中国注册会计师, 2013(11): 77 - 82.
- [8] 张宜霞. 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收费的影响因素——基于中国内地在美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 会计研究, 2011(12): 70 - 77.
- [9] 李补喜, 贺梦琪. 内部控制审计费用影响因素探析——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数据检验[J]. 经济问题, 2014(9): 88 - 93.
- [10] 伍利娜. 审计定价影响因素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首次审计费用披露的证据[J]. 中国会计评论, 2003(1): 113 - 128.
- [11] 张学勇, 何姣, 陶醉. 会计师事务所声誉能有效降低上市公司权益资本成本吗? [J]. 审计研究, 2014(5): 86 - 93.
- [12] Fama E F, Jensen M C. Separation of ownership and control[J].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 1983, 26(2): 301 - 325.
- [13] Adams R B, Ferreira D. A theory of friendly boards[J]. Journal of Finance, 2007, 62(1): 217 - 250.
- [14] Eisenberg M A. Legal models of management structure in the modern corporation: Officers, directors, and accountants [J]. California Law Review, 1975, 63(2): 375 - 439.
- [15] 刘诚. 董事会的功用及其社会性: 灰色董事研究评述[J]. 财经问题研究, 2015(12): 23 - 29.
- [16] 邱兆祥, 史明坤. 独立董事个人特征与任期内公司经营绩效[J]. 财贸经济, 2012(11): 56 - 62.
- [17] Johnstone K, Li C, Rupley K H. Changes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associated with the revelation of internal control material weaknesses and their subsequent remediation[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2011, 28(1): 331 - 383.
- [18] 尹律. 盈余管理和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披露——基于强制性内部控制评价报告披露的实证研究[J]. 审计研究, 2016(4): 83 - 89.
- [19] 汤晓建, 张俊生. 自愿性披露内部控制审计费用能够提高内部控制审计独立性吗? [J]. 审计研究, 2017(3): 90 - 96.
- [20] Kim K, Mauldin E, Patro S. Outside directors and board advising and monitoring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Accounting & Economics, 2014, 57(2 - 3): 110 - 131.

[责任编辑: 黄燕]

Board Function, Standard for Quantitative Identification of Internal Control Defects and Internal Control Audit Fees

LU Yating^{1,2}

(1. School of Accounting, Tianji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Tianjin 300222, China;

2. 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Tangshan University, Tangshan 063000, China)

Abstract: Taking Shanghai and Shenzhen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that separately disclosed the internal control audit fees from 2012 to 2016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internal control audit fe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upervisory and consultation functions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nd the board's discretion in determining the standards for quantitative identification of internal control defects.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supervisory function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nd the quantitative identification standard of internal control defects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audit fees of internal control, and the consultation function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is negatively related to the audit fees of internal control. And it also shows that quantitative identification standard of internal control defects has partial mediating effect on the influence of supervisory function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n the audit fees of internal control, and it has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influence of consultation function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n the internal control audit fee.

Key Words: internal control audit fee; board of directors; supervisory function; consultation function; standard for quantitative identification of defects; corporate governance